

古籍保护

专刊



3-6版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设计：常英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从内而外，时隔38年，嘉业堂完成了又一次大修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今年春节期间，位于南浔古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修缮后重新开放。嘉业堂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是晚清藏书家刘承幹于1924年建成，因宣统帝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命名，现为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

2019年11月23日，藏书楼主开始全面闭楼改造，原定于2020年12月完工开放，因疫情拖延工程进度，于2021年底通过文物相关部门的验收，开放时间刚好推迟了一年。据这次大修的见证者、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副主任郑宗南介绍，这次大修是继1984年后的再一次大修，涉及藏书楼屋面整体翻修、大木构架剔补和加固、外墙面修缮、搁栅加固、地砖加固、明瑟亭修缮等19项工程。

外修：让建筑整体更坚固

100多岁的藏书楼，经过勘测，发现之前有了倾斜，所以整体需要一次大的翻修和加固。比如大木构架，经过数十年上百年，



布达拉宫完成3000余函珍贵古籍文献普查登记

本报据新华社讯 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自2018年底启动，截至2021年底，已完成超过3000函、百万叶珍贵古籍文献的普查登记工作。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作为西藏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宫堡式建筑群，布达拉宫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式、数量众多的宫藏文物，被誉为“藏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总投资3亿元，项目周期为10年。项目启动后，西藏自治区

木料已经老化，这次进行了加固和剔补。瓦片有的用的时间长了，有破掉和塌陷的地方，也都换掉。

按照藏书楼一贯的布置，之前，不少藏书存放在二楼。因为原先技术不发达，二楼通风、防潮条件好。但是岁月漫长，楼上的东西太重，建筑主体也发生了一定角度的倾斜。为了给藏书楼减负，这次翻修后，藏书和雕版存放进行了调整。除了搬到一楼外，部分藏品运到了杭州。其中“雕版原有20万片，15万片浙江官书局的运到杭州，5万片原属于嘉业堂的留下”。

内修：让建筑主体更健康

这些“外科手术”，让建筑整体更坚固，同时，一些“内科手术”也让这一建筑主体更加健康。比如整个藏书楼装了摄像头，可以无死角地覆盖每个角落，同时安装了电缆报警装置，限定区域内如果有人闯入，系统会自动报警。此外，下水系统也进行了整体更新。

“整容”：保留百年藏书楼韵味

除了“内外科手术”，嘉业堂还经历了“整容手术”。嘉业堂毕竟是百年建筑，外表苍老，掉漆、褪色、脆化等问题，这次也一并修复了。比较典型的是正厅上挂的“钦若嘉业”牌匾，这是宣统帝赐的，也是嘉业堂名字的来源。此次大修后，牌匾上的字按照原来的工艺重新进行了修补。字是用金刚砂粘上去的，古代用的黏合工艺是用糯米和明矾，这就是堆砂技术。这次也是，

先加上传统的黏合材料，再补上金刚砂，四个大字恢复了神采。其他如外墙面修缮、家具擦亮、门窗刷漆……很多精细工作，都是手艺人来现场完成的。郑主任表示，这次大修是非常小心地“修旧如旧”。比如瓦片，没有坏的继续使用，并没换新；墙上的部分青苔不影响，也没有完全清理掉，既节省成本，更重要的是保留了百年藏书楼的韵味。

功能改造：更直接服务读者

这次大修之后，部分之前不开放的房间，将开放书柜参观。郑主任表示，古籍放在书柜里，将像博物馆一样，让大家可以隔着展柜看到里面，让大家了解当年藏书家藏书的氛围，了解当时的藏书情况。

此外改动比较大的是辅房。除了与主楼一样整体加固、美化之外，之后的作用将改变。辅房原先放雕版，现在部分运到杭州后，准备腾出空间来，增加部分现代藏书，与古代藏书对应，让大家在这里读读书、喝喝茶；同时设置雕版印刷、古籍装帧等体验功能区。“图书馆跟着时代进步，增加这些新的展示，让读者全方位了解藏书楼。”

刘承幹在100年前建楼之初，写了一篇《嘉业藏书楼记》，写到建藏书楼的巨大花费以及初衷，他说并不是只为了藏书，而是希望知识广泛、永久地流传，仿照苏东坡的朋友李公择，开放给大家阅读。

嘉业堂辅房将进行的新的改造，更直接地服务读者、推广阅读和文化，算是藏书楼的传承吧。

29378叶贝叶经整理、基础建档和编目工作；完成136函85944叶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完成23函3017叶藏纸修复工作。

据悉，在推进古籍文献普查建档、目录整理、分类、对勘等工作的同时，布达拉宫管理处还开展了馆藏古籍文献病害研究、古籍文献写印色料溶解性研究、贝叶经DNA研究、贝叶经病害调查工作、藏纸基本性能数据测试、古籍文献档案整理及编码研究以及古籍文献保存环境检测等工作。

一张驱逐『洋板』的檄文

□艾俊川



这张《逐逐洋板夹带书贾檄文》，收录在《国际藏书家古籍收藏与保护研讨会论文集及珍本图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清末刻本，从版本上看未见稀奇，但从出版印刷史角度看，值得细读。

“檄文”没写发起人，究竟是谁散发的，只能从内容来分析推断。

“檄文”针对的是售卖“洋板夹带”的“书贾”，理由则堂而皇之，以维护圣谕祖训、拔除作弊恶习为说辞，涉及的利益人群有出版、售卖洋板夹带的商人和购买、使用夹带的士人。“小本夹带”古已有之，从“檄文”中也可看出，自乾隆至道光屡禁不止，原不分“洋板”“土版”。如果这是痛恨夹带的正派举子发起的行动，就应针对所有“夹带”，而不是只针对“洋板”，更不是只针对“书贾”。因此，这是一场书贾间的斗争，洋板书贾若被驱逐，受益者只会是他们的竞争者，即出版售卖传统小本夹带的雕版书商。

“洋板夹带，方寸之纸，可印数篇；数字之函，约文二万；携入场屋，准可遇题；钞录一篇，定许必售”，“檄文”中的这几句话，其实已经道出问题的实质——它反击的是新技术对传统印刷市场空间的无情挤压。

19世纪下半叶，石印、铅印等西方印刷技术陆续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传统技术进行市场竞争。这些工业时代的技术，具有手工技术无可比拟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小本夹带”或说举业书市场正是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

和今天的“教辅书”一样，清末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举业书市场利润丰厚，是出版业兵家必争之地。光绪六年（1880），上海点石斋用石印法缩印《康熙字典》，短时间内即发行十万册，获利巨大。此后各地开设的石印书局纷纷出版科举用书，其中不乏小本夹带。《清稗类钞》说：“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书济之。”科举考试存在的最后几十年，考场规矩松弛，夹带之风盛行，“洋版夹带”成为赶考者的必备。

《逐逐洋板夹带书贾檄文》内称“似此洋板夹带，十数家书铺竟公然发卖”，清末京师书业繁盛，“十数家”书铺数量并非很多，说明这张“檄文”散发的时间，是在光绪间石印举业书进入市场不久，但它对原有市场的冲击力已经很大。

石印（包括小号铅字所印）举业书在市场上拥有的优势，一是成本低廉，只有雕版的几分之一；二是成书迅速，“百页之书，五日可完”，三是使用照相缩放技术，文字可以极度细小，“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厚理”，每一项都是对雕版的沉重打击。（参见沈俊平《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生产与流通：以1880—1905年的上海民权石印书局为中心的考察》）特别是用来夹带作弊的书，必须开本小、文章多，像石印的《小题三万选》，每叶字数多达六七千字。难以雕刻细小之字是雕版印刷的命门所在，遇见这种对手，雕版夹带完全无力从技术上竞争，其从业者也只能散发檄文，试图通过政治力量来解决问题了。这张“檄文”的背后，反映出技术变革时期传统印刷业的抗争与无奈。



典籍中的古代冰雪运动

□谢冬荣 国家图书馆

壬寅虎年春节期间，中国奏响了别开生面的“冰与火之歌”，再度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冰雪运动成为当下人们关注的热点。我国冰雪运动历史十分久远。为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给北京冬奥会提供文化助力，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谢冬荣特参考研究论著，梳理了历代典籍中的冰雪运动。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我国开展冰雪运动的历史十分久远。据有关研究，位于阿尔泰山南麓、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是世界滑雪运动最早的起源地，该地发现的一万年前的岩画上就有人物滑雪的图像。唐代编纂的《隋书》卷八十四记载北室韦“地多积雪，俱陷坑穿，骑木而行”。室韦为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北室韦为其五部之一，主要居住在现黑龙江省西北部。《隋书》北室韦“骑木而行”是我国古代关于冰雪运动的较早记载。而《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鹘下”中记载：“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日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书中所说的“木马”可以视为最早的滑雪工具，这较之前的“骑木而行”更加明确。

宋人孟元老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北宋，特别是徽宗时期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该书卷十四：“（十二月）此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装雪灯，以会亲旧。”书中说言“塑雪狮，装雪灯”反映了宋人的冰雪娱乐活动。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三则记载信安、沧景之间的人，“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凌床是现有典籍记载中所知最早的冰上活动器具。信安、沧景现为河北霸州、沧州一带。

刘若愚《明宫史》卷一载“自阳德门外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由北安门外药王庙西桥下入，潏洄泔漾，蓄泄惟谨，莲藕鱼虾味最美。其萑苇茂密，水禽上下，俨若江南景云。冬至水冻，可拖床，以木作平板，上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三二人，行冰上如飞，遇积雪残云景更如画”。这一条材料反映了明代北京冬天的冰上运动。其中提到在冰上行走如飞的木质床，与上文宋代的“凌床”颇为类似。

及至清代，由于满族兴起于东北，对冰雪运动尤为重视。据金梁等编译的《满洲老档秘录》，在入关之前的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上与众人举行冰上“踢行头”和赛跑游戏。针对赛跑游戏，根据成绩高低设置了奖项及奖金。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冰上运动会。入关后，“冰嬉”被视为国俗。《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一记载在西苑太液池“冬月则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每至冬季，清政府往往会在北海太液池等地举行冰嬉。《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就详细说明了清廷开展冰嬉活动的相关要求及奖励办法：“冰戏，每岁十月，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



帝京岁时纪胜

箭、球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球等伎。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名，服红黄马褂，余俱服红黄齐肩褂，射球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俱服马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以次走冰较射。陈伎毕，恩赏银两，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俱由内府广储司支给。”

乾隆皇帝特别重视冰嬉，为此还撰写了《冰嬉赋》一文。他还要求内廷诸臣各制一篇呈览。时任刑部侍郎的钱陈群即撰有《冰嬉赋》，收录在其《香树斋文集》卷一中。乾隆嘉庆时期学者石韞玉在《独学庐五稿》卷二《明韩襄毅公游西苑记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己至瀛台观赏冰嬉的见闻。

冬天在太液池上玩冰床是清人记录的重点。高士奇所著《金鳌

退食笔记》卷上“太液池”条中记载了寒冬之时北海冰上的玩拖床之戏。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冰床滑擦”条言冰床名为“托床”，与此前的“拖床”应为一物。而乾隆皇帝在坐过冰床后，撰有《御制腊日坐冰床渡太液池志兴》一诗，抒发自己坐冰床的感受。

除了冰嬉和冰床之外，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二还记载了宫中冬月“打滑挞”的游戏：“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着带毛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打滑挞可以称为古代的滑冰游戏。

在清代，着冰鞋滑冰是喜闻乐见的活动。《都门竹枝词》收录了《冰鞋》诗一首，其中“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形象反映了滑冰的乐趣。晚清诗人宝廷诗集《偶斋诗草》卷七收录《冰鞋》诗，用诗歌的表现手法，再现当时之人着冰鞋滑冰的情景：“铁若剑脊冰若镜，以履踏剑磨镜行，其直如矢矢逾疾，剑脊镜面刮有声。左足未住右足进，指前踵后相送迎，有时故意作欹侧，凌虚取势斜燕轻。飘然而行陡然止，操纵自我随纵横，是耶洛仙非例子，风胡能御波能凌。”《津门杂记》卷中记录了晚清之时天津一地冬月用冰床、跑凌鞋的情况。冬季玩冰床、溜冰鞋已然成为北方各地冬季的习俗。

古纸背后的故事

□黄艳燕 孔杰旦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纸 埃及莎草纸

莎草纸，又称纸莎草、莎草片，是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载体，其原料为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并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及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在埃及博物馆中保藏着一些古埃及莎草纸，其纸张、颜料保存非常完好。

制造莎草纸非常简单：先把纸莎草割下来，剥掉外面的一层硬皮，按要求切成一段一段，泡到水里。泡好以后，捞出来用刀刮成薄片，然后把这些薄片铺到平整的石板上，盖一层亚麻布，把另外一块石板压在上面。草茎里的水分被挤干，再经过几天自然晾干，揭开亚麻布以后一张草纸就可完成。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的莎草纸是古埃及第五王朝的一本账本残片，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那时候，莎草纸是王权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用品。随着莎草纸书写性能的开发，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等）开始使用这种神奇的纸质传播媒介，莎草纸成为当时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书写载体。

公元9世纪左右，如此盛极一时的莎草纸突然销声匿迹了。通过考古得到

的只字片语，人们只知道莎草纸是利用尼罗河两岸浅滩上生长的一种名为纸莎草（*Cyperus papyrus*）的植物加工而成。但由于尼罗河两岸被多次清理，破坏了纸莎草的生长环境，使得这种当年随处可见的植物不再生长，故而莎草纸也随之灭绝。

18世纪末，欧洲考古学家开始涌入埃及，他们在古老的老法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颜色鲜艳的莎草纸画，使得莎草纸再一次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然而，学者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都未在其中找到详细的莎草纸制作工艺。20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先后成立了专门的“纸草卷学”研究机构及相应的教授职位，埃及莎草纸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学科——纸草学。经过众多学者数十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在1968年，曾任埃及驻中国大使的哈桑·拉加卜——一位亚历山大人成功地恢复出了失传千年的莎草纸造纸工艺。

世界上最“毒”的纸 狼毒草纸

1300多年前，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进藏，将造纸术带入西藏，当地工匠就地取材，找到狼毒草这种替代造纸原料。日月星移，现今，藏区的印经院，印刷高品质的经书，一定要用狼毒草制成的藏纸印刷，因为狼毒草纸防虫鼠，抑菌菌，坚韧而怕水，寿命极长。

狼毒（*Stellerachamaejasme*），瑞香科（*Thymelaeaceae*）狼毒属植物，又名断

世界上很早就有了“纸”，其中，中国的“丝絮纸”，墨西哥的“阿玛特纸”和埃及的“莎草纸”，并称为“世界三大古纸”。此外，以“毒”著称的藏纸——狼毒草纸亦世界闻名。今天让我们细数一下“莎草纸”与狼毒草纸背后的故事。



埃及博物馆中保藏的古埃及莎草纸

肠草（内蒙古），拔萝卜、燕子花（河北），馒头花（青海）。产于我国北方各省区及西南地区，大多生于海拔2600—4200米的干燥而向阳的高山草坡、草坪或河滩台地。狼毒的毒性较大，可以杀虫；根可入药，有祛痰、消积、止痛之功能，外敷可治疥癣；根还可提取工业用酒精，根及茎皮可造纸。

藏区现存的狼毒纸造纸区主要有3个：四川德格印经院（德格藏纸，上世纪60年代一度停产）；西藏拉萨尼木县塔荣乡雪拉村（尼木藏纸）；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迪庆藏纸，上世纪50年代一度停业）。这些地区藏纸停产的原因大同小异，主要是原料过度采伐，造成了生态一度破坏，令人想起唐代著名文人舒元舆的《悲刺溪古藤文》，悲叹因为过度砍伐刺藤用以造纸，致使刺藤灭绝生机的惨状。好在目前狼毒草的产地政府，已经在鼓励人工种植，避免影响生态环境。

细数莎草纸与藏纸（狼毒纸）背后的



狼毒草茎皮料

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埃及还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文化十分依赖生态环境的状态。如何在弘扬继承人类传统文化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好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是人类在新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

师玉祥： 在修复路上一条道走到底的幽默大师

□本报记者 刘晓立

与新中国同龄，自称有“多动症”，说话风趣幽默，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南传习所导师师玉祥在修复工作中与工作外有着强烈的反差。“我性子很急，自小就热爱各种运动，不管是长跑、爬山，还是游泳、打球，一直到现在，每天也要打两个小时羽毛球，但进入修复工作中就很快能静得下来。”一动一静，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统一在“认死理”上，让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保持初心，坚持到底。

湖南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室位于馆内4楼，门外是考研学子窸窣的诵书声，门内是安静伏案、各自忙活着的古籍修复师。73岁的师玉祥就坐在其中，穿着和大家一样的工作服，俯身案前，老花镜搁在鼻梁上，一支修复笔在一张破损的古书页上轻巧挪移，这画面仿佛经过斗转星移，多年未曾改变。



中国书店学艺， 归来一心做修复

1972年，23岁的师玉祥来到湖南图书馆工作，当时对图书馆都还很陌生的他，很快就被派往北京中国书店学习古籍修复技艺。“我们馆和中国书店当时有一些交换副本的业务往来，关系比较好，我去之后，不仅给我安排了房子，还指定了魏忠虞师傅让我跟着学习。”魏忠虞先生是中国书店第一代修复大师，在业界很有名气，同一个办公室的还有汪增仁、韩秀芬等知名修复师，“我师傅有时候会交给我一些事情做，但更多的时候是给我看，不管是修复，还是装订等，也会提醒我多看其他师傅做事，万事留心皆学问嘛。”一个毫无保留地教，一个万事留心地学，一年多以后，师玉祥学成出师回到了湖南图书馆。

学成归来后，师玉祥仅在楼梯间获得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作为办公地，条件比较艰苦，但性急的师玉祥却越来越爱上了这份“安静”。“我性子很急，看走路就看得出来，如果你看着我在慢慢走路，肯定是病得很重了，但只要一进入到修复中，我就会很快进入角色，安静下来，我觉得做修复对我的性子也是一种磨炼。再加上受家庭对读书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敬重的感染，我看到古籍就不自觉生起保护心，对古籍修复也就越来越有感情了。”很长一段时间，湖南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处于没有统一管理、人员单一、场地工具简陋的状态中，直到1984年位于韶山北路的新馆开馆，修复组才正式组建起来，不仅有了50余平方米的专用修复室，工具、设备和材料越来越丰富，5个人的人员编制也逐渐成熟，一直延续了多年。

“现在加上我这个‘临时工’，已经7个人了，很不错了。”尽管按照修复师数量与待修复古籍的数量来说，还有很大差距，但师玉祥认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恨不得一天把所有古籍都修好，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保证能够长久地有人去传承这项技艺，守护这些古籍。

在师玉祥的身上，有一种朴素的信仰，那就是“乐天知命”的感恩之心，他常常对办公室的年轻同事们说：“当年条件虽然不好，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不会去怨天尤人，更不觉得后悔，现在大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事业也与时俱进，更不应该放弃。”师玉祥常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劝诫年轻人：“这是一份好工作，对人的修养都有很好的帮助。”

传统做法遇上新理念， 有思考才能有进步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古籍修复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复队伍越来越壮大，“整旧如旧”等四大修复理念也逐渐确立起来，修复事业迈上正规化、科学化的道路。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常常会产生传统做法与新理念的碰撞，师玉祥亲身经历并有所感悟：传统技艺要很好地传承下去，当然也不能排斥新的研究，只有思考才能促进修复行业与时俱进。

以金镶玉装为例。我国古代的正规书籍，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装帧形式经历了简册、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七种主要形式。这些形式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以及社会需要的变化而产生的。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装帧形式——金镶玉装，则与上述七种装帧形式的产生过程不同，它是古籍修复者在对古籍进行修复时，根据古籍的现状和破损情况，而采取的一种装帧形式，是以白色衬纸衬入对折后的书页中间，超出书页天、地及书背部分折回与书页平，以使厚薄均匀，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页订在一起。“过去在中国书店，很多藏书人会要求我师傅把破损古籍修成金镶玉的形式，不仅美观，而且在翻阅时不容易对书籍造成伤害。但金镶玉这种装帧形式比较耗时和材料，我师傅也很少做。”师玉祥介绍说，“现在的理念认为，金镶玉改变了古籍原本的装帧形式，不符合整旧如旧的原则。”那应该怎么看待两者的碰撞呢？

“金镶玉也叫惜古衬，也就是爱惜古籍加衬纸进行保护的意思，我记得我修的第一部书就是做成了金镶玉装。其实一本书要做金镶玉装也是有研究的。比如有些书实在破损到无法翻阅了，金镶玉装可以起到三边保护的作用，修好后翻阅不容易再次损坏。”师玉祥认为对于破损极为严重的古籍，金镶玉装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当然出于保留古籍原有信息考虑，“整旧如旧”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需要在实践中去具体考量。

古籍修复从大的工序来说虽然不多，但小的工序却不少，且每道工序都有讲究。“拿打糨糊来说，怎么算打得好？首先要面粉好，我们过去都是自己提面筋，提完面筋，就把淀粉泡在一个大水缸里，要用的时候拿瓢把上面的水赶开，把淀粉挖起来打，打出来的糨糊要稀稠适中，尤其是颜色看上去要去很舒服。”之所以要提面筋，是为了防生虫和起霉，同时打糨糊时放明矾也是为起到同样的作用。“现在用的糨糊都是买来的，很多可能没有经过提面筋，而且加明矾也是不被允许了，据说是对纸张有伤害，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待下一代人去研究。”

“我很期待年轻人对这方面有研究，有思考。如果没有思考，只能墨守成规。我们古籍修复事业虽然是传统手艺，但也一定要有发展。”让师玉祥欣慰的是，老一辈的传统手艺已经和新一代人、新的仪器设备、新的思想融合起来，促进古籍修复事业不断进步，越来越好。

传承更重精神， 希望多陪伴后辈

多年来，师玉祥在湖南图书馆修复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同时也为贵州、广东等周边省份培训了不少古籍修复人才。2016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南传习所成立，退休后的师玉祥又被馆里返聘回来，“重出江湖”收徒传艺。在师玉祥的眼中，古籍修复能够使古籍所承载的文化得以传承，而修复这门手艺，也需要传承。

对于修复技艺的传承，师玉祥更看重工匠精神的传承。“首先要把心思放在修复事业上，然后要在频繁练习中进行体悟，之后才能进步。”师玉祥对所有徒弟都有十二个字的要求，那就是静下来、坐得住、耐得烦、不怕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进入修复工作中，就要安静下来，有心情波动的时候，或者碰到难题有所急躁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这种敬畏和坚守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现在师玉祥感到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徒弟们在一起时，“他们都很尊重我，对修复工作都非常有热情”。谈到未来的规划时，师玉祥说：“我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坚持锻炼，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多陪伴一下大家，当然有一个前提，还是要大家需要我，如果大家不喜欢我了，我就别来了。”师玉祥保持着一贯的幽默风格。在后辈的眼里，师玉祥是一位慈祥、幽默的人，工作犯错了，他会严厉得让人害怕，但回到平常，他无疑是“可爱”的。

如今，师玉祥在修复道路上已经坚持了整整50年，有过“冷遇”，也看见过“红火”，但始终如一。他说既然从事了这一行，就要专心投入进去，“我是终于一条道走到底了，现在就希望能身体好，多陪伴大家，让这条路越走越远”。



清代廉吏阎敬铭刻书琐记(上)

□范月珍 山西省图书馆

阎敬铭，字丹初，号约斋，陕西朝邑人，累迁东阁大学士。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生。道光乙巳（184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九年（1859），调任湖北，后擢升为湖北按察使。同治二年（1863）任山东盐运使。同治六年（1867）因疾归乡，以工部右侍郎召，不起。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饥，奉命察视赈务。光绪八年（1882）任户部尚书，光绪九年（1883），赐紫禁城骑马，兼任署兵部尚书。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山西寄寓，追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阎敬铭理财有道，为官清廉耿介，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有“救时宰相”之称。他个人在晋陕两省也有不少生意，在朝邑（今陕西大荔）建“丰图义仓”、购义田，在终南山、蒲州（今山西永济）虞乡屯里村大量置地并出租，在运城有盐号，在解州设散馆、刊刻图书。

阎敬铭虽是陕西人，但长期在山西居住和工作，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家乡朝邑与山西蒲州仅一水之隔，阎敬铭年少应试时常路过此地并得到过当地百姓的救助，为报答救命之恩，成年后在蒲州虞乡屯里购买了院子，长期居住。同治六年（1867）始，他在蒲州、解州、临晋一带的书院讲学休养。光绪三年（1877），山西等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灾，史称“丁戊奇荒”，晋南一带的平陆、蒲州、解州、绛州几地犹甚，朝廷特派在蒲州养病的阎敬铭协助曾国荃督办山西赈灾事宜。光绪八年（1881），他离开山西前往北京履新。

阎敬铭在山西居住和处理政务之余，担任解梁书院主讲。解梁书院在光绪年间刻过数十种书，从数量上看，这些书被称为清代山西书院刻书之最也不为过。但是，有关解梁书院刻书一事未见任何史料记载，而阎敬铭与解梁书院刻书之间是否有关联，也不得而知，阎敬铭后人曾为他撰写专著，但刻书一事只字未提。

近年来，阎敬铭部分手札相继出版，为阎敬铭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一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虞和平主编、2017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二是张永江主编、2018年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晚清廉吏阎敬铭手札》，前者收录阎敬铭书信七十六通，主要为光绪十年（1884）至十二年（1886）间所写，后者收录阎敬铭书信一百九十七通，主要为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三年（1887）所写，这些书信札有政务公函也有亲友私函，在亲友私函中，他多次提到刻书的事，信函的收信人是阎敬铭的两个儿子阎迺林、阎迺灏和管家李念闻。这一时期他在在北京履新，先后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也正是由于阎敬铭在北京，家族生意和子女在晋陕，才有了这些珍贵的信函。阎敬铭一生著述不多，信函所记录的为官治理、读书立身、教育子侄、经商理财、处世待人、选刻图书等诸多琐事，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信函的时间跨度不算长，但先后提到刻印的书籍就有十余种之多，包括《稽古录》《时艺开》《时艺向》《时艺穷》《资治通鉴》《福永堂汇钞》《唐鉴》《六艺纲目》《怪华馆诗文集》《解梁丛书》《有诸己斋格言丛书》，以及司马光著述等。信函记录刻书一事虽然零碎，但多次提到选本、写样、邮寄、校对、刻板、纸张、装帧、费用、售卖等细节，信中提到的书都有传本可印证，是清末刻印图书难得的一手资料。

壹

与解梁书院的关系

据光绪《解州志》所记，阎敬铭担任过解梁书院山长。据信札所知，他的家人长期居住在解州，他离开解州后与解梁书院关系仍然密切，且参与书院重要事务并在书院刻书。

他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八日致迺林：“家中狭小，移馆书院为要。”七月二十四日致迺林：“来年书院山长吾意中无十分妥人，可由州绅自请，

但刻书事，来年仍须在书院为之，若全眷不来京，两孩读书仍须借院屋，或东院、西院、上房，借定一处。”冬至致迺林：“解、虞山长可各我前信定否？延师至难也。”

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四日致迺林：“解梁山长已定否？闻你荐以管桂林，我不知其人，闻不错，好先生甚难得。”四月十九日致迺林：“夏天或带林柳移于书院读书，较家稍宽敞，与管山长商之。”

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二十八日致迺林：“《语类》原册你所看字皆不错，我又看，改数字，皆写书上，可查明即挖改。每叶一、二号，下黑，木长块，

皆刻“解梁书院”四字，惟《福永堂从抄》中不刻此四字，以此板归我家，此外一概皆如此刻，此言已属矣”。十月十八日再致迺林：“临行与我商书院各事，我早欲为解州交代一切，固将现有之款分付解、虞、蒲州之处，为解梁立背经课详开一单，交纾江带交解州商，商并荐樊生基为山长，背经者为李春远。不知解州谓然否？”十月二十日致迺林：“拨付三书院事，切于今冬安妥妥协，望中须吾家还银一千七百，方足分拨。”十一月初二日致迺林：“开年我进京，家移屯里、解州多年，挪借书局五六千金，必为还清。”

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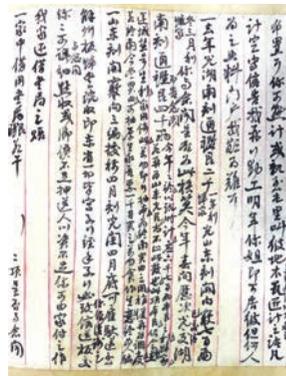
有关外省刻板

在刻印多卷书时，解州当地匠人往往无力承担，阎敬铭也会在外省刻板，刻好后将书板运回解州并交解梁书院刷印保存，版心仍然刻“解梁书院”。信中就多次提到在山东、湖南、陕西等地刻书的事。

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一日致乃竹：“吾付湖南刻《通鉴》银二千两，又付山东刻《开》《向》《穷》银七百两，此板亦付解梁”。二月二十六日致乃竹：“山东刻《开》《向》《穷》三编，接信四月刻完，闰四月底可雇驮运至解州，板归书院收印，东省一切皆官子行经手，子行必致信送板交你（旁批：你信后谓之），你（旁

批：与念闻）可详细点收，或脚价不足。押送人以资不足，你可由家付之，作我家还借书局之账。家中借用书局银若干？家中寄存书局银、钱若干，二项是否与念闻账相符？家中寄存书局银若干？银在何处存？”三月二十八日致迺林：“解州刻书必赶冬天，一切刻完可告摹生、念闻，速为之，或告摹生，明岁他若无事，或在同州、或在西安李菊翁处写刻亦可。”四月十九日致迺林：“收官子行济南来信，书板已刻完，下月半由东起身。”五月初三日致迺林：“山东书板何日送到，一切你不暇管，属念闻诸照。”五月二十七日致迺林：“《开》《向》《穷》板片收到（旁批：带新印二部，一付念闻，一留吾家），大为心慰。回信及付银都极妥，外与念闻信言一切。”十月十八日致迺林：“江蒙

方信二纸，为运《通鉴》板事，与念闻看知，照行。”腊月十七日致迺林：“至开春，湖北送《通鉴》板书各事，详念闻函，你若早来京，而板书未到，即详告念闻。”



叁

图书写样与校刊

从信函中能大致了解刻书的工序、选纸、装帧和图书售卖、资金来源等细节，也能看到阎敬铭对刻书严谨用心的态度。他虽在北京，但每部书的写样和书稿都要亲自校对，一般先请人在解州或北京写样本，样本校对两、三遍后随家信或寄或托人带到北京，他亲自校对后寄回解州，工匠依样本覆纸刻板，刷印样书，迺林、迺灏等人对样书校对后寄到北京，经他校对，再将样书寄回解州，工匠依校后的样书对雕板进行挖补修改，然后正式刷印。

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份为作者推算）二月二十七日致迺林：“今托陕西道唐道名带去《求阙斋语》一本，竹起行后，我赶为之者，竹再详看二遍即刻，并将湖北刻《轺轩语》找一本（旁批：前刻似有潘纬为序，此勿刻，余诸照原书，勿改增字），合以九、八，共校刻之为要。有此十余本，作人读书不外乎此。特刻之，以教尔等。”四月二十七日致迺林：“新刻《涑水纪闻》错字不少，与《稽古录》，我无书可校，也无功夫。”光绪十年（年份为作者推算）六月初九日致迺林：“《聪训》《求阙》各书行之，陈洛校字恐看不清。”光绪十年八月十七日致迺林：“《履言》校字，你需逐一看过为要，前摹生带回《传家集》模糊，字可，此须斟酌。前头是否刻有陈宏谋序文，及书内有无‘陈宏谋’字样？否则，‘宏谋按’三字无报我，事繁不暇，而伊已带回矣。《司马集》刻之太慢，且催之。”“已刻《格言》各书，你再细看，错字不少，即速挖改，所要《格言》各书，托便带来，书院共有若干人，师生、尚相要否？”

某年二月初一日致迺林：“《唐鉴》若样本不易写，则此书可不必刻，惟司马公《易说》必得付刻，或写《易说》、写《弟子箴言》样本为要也。”某年三月二十一

日致迺林：“你所校《稽古录》我看一遍书，见用心，盖有补原校所不及，今带回原本四册，交念闻即为改补。此书湖北原刻甚坏，虽经屡校，未必再无错误，只好随看随改也。”某年九月初四日致迺林：“格言各书《司马集》现刻几本？何时可完工？刘梧冈前带查明漫漶字一纸，须斟酌之，吾记似照刻，查明告我。无陈宏谟（谟）序及各卷无陈名，此纸有‘宏谟（谟）按’三字，则大不安。《履言》校字须详查。”某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迺林：“所刻书错字单可即挖，新刻书你须详看详校，《宰家》《双节》《教谕》《训子》《初学》各外签你可改字，刻为一律，格言书可集为丛书，外签须大小一律（旁批：除《二语》《弟子》《小学》《千文》《家训》《麻桑》外），《家范》《要仪》《稽古》《涑水》《司马》四种外签亦必一样，但不入丛书。”某年某月初一致迺林：“以后不再写宋字样本，与刘梧冈商，样本写完可否即写宋字正本？《书仪》刻完若无可刻，即刻《双节》《樗虫谱》，原刻本若圈句亦照。”

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初十致迺林：“《福永堂汇钞》（旁批：可缓刻）原本二册，访运城要便带京，驿递恐失，更（旁批：尚）有所更正。”十月初六日致迺林：“《司马集》或将已刻，若托便人全带或于家信中随带一本皆可，但必将原本带来，方能校对无误。”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份为作者推算）十一月初六日致迺林：“告刘梧冈，明年要刻《唐鉴》《课子随笔》《弟子箴言》，字亦不少，须留匠人，要要。”十一月二十二日致念闻：“印书之说可毋庸议改，错字单亦看过，此后校书不但校字画，必校其文理。校书大为要事，切切。留心至重。”“前带隶书各书签与丛书前面目录，与《福永丛抄》目录（旁批：原写纸），仍即带京，皆有添刻，竹带回《唐鉴》《弟子箴言》二书，先写样本，校各处错，再照写宋字，随后又有《课子随笔》二本，现在京写样本，春初照带回即影。”腊

月二十二日致念闻：“京中写有（旁批：正月写完）《课子随笔》（旁批：样本），开年带回。《福永从抄》目录及跋语照原式写一册寄京，丛书封面亦照原式写一册寄京，勿误。”八月二十一日致迺林：“托临晋拔贡李到带去《传家集》二十五本，错字俱粘红签，即速照签挖补，要改补处必要牢固结实，倘有活动脱落，大为不好。凡改补皆如此，切告匠人并告摹生。又，校字之要紧在写清宋字，精细详校二三遍，不在上板刻成之后。近年刻书错者太多，挖补板印不牢固。此后写了宋字及刻成，在陈、李校后，迺林即再详校一、二遍为要。”“此书我未校者大约是三本，刻好每次家信带一本来。”九月初二日致迺林：“催书局刻书，刻成你即详校改妥印行，即不先带京看亦可，丛书封面及各书签已写（旁批：必一律欧体为好），刻否？即速为勿迟，吾意欲年内了清各事。”

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一日致迺林：“新刻《福永汇钞》上卷收到，无悔校字，随后等《传家集》校完带回。”二月十六日致迺林：“带回《课子随笔》卷上一本（旁注：样本），卷下随后即带，照写宋字，即速刊刻，《唐鉴》不可刻也。”三月二十八日致迺林：“前信带回《课子随笔》上卷样本到否？兹带《课子随笔》下卷，即催写宋字，兹带《语录》一册，即挖改之。”四月十六日致迺林：“写刻勿误，《司马集》与丛书十四种、《福永堂汇钞》今年能全完为好，前带《稽古录》四本，细心挖改，凡校字至要，尤要在校写宋字也。”闰四月二十四日致念闻等人：“凡刊刻及已校各书皆已带回京，家无可校及欲刻之书，《唐鉴》刻与否皆可，惟丛书十七种必刻全也，刻书目为要。”十月二十日致迺林：“刻书既未完工，亦须查问。而校字，他人文理未皆通，勿留笑话，印书事亦可参管。”腊月十九日致迺林：“《唐鉴》刻完就停工，近年所刻，挖补太多，皆校者不通之故，所以不敢再刻也。”

(未完待续)